学术专论

大臣以及大臣之道*

——王船山经义、史论对政治实践之思考

谢茂松

［摘要］本文提出宋明道学到王船山那里，心性才与实际的政治操作真正紧密地内在关联起来，并有效地解释实际的历史。本文以船山经学与史论为中心来讨论此点。第一部分讨论其《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周易外传》等经解将心性与政治实践的关联落实于"志"、"量"、"识"，以及"心有广大深远之术"。第二部分则讨论心性之学落实于政治的实践者"大臣"身上，并讨论"大臣之道"。"余论"部分会探讨船山在其经学、史论中对于心性之学与大臣之道的思考与其本人在南明永历王朝的刻骨铭心的政治经验之间具有血肉般的关联。

［关键词］王船山　经学　心性之学　为臣之道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0）－04－0053－17

The Study of Mind-Nature and the Way of the Minister：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Practice and Wang Chuanshan´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lassics and Hostorical Commentari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in Song-Ming Neo-Confucianism of Wang Chuanshan，mind-nature（*xinxing*）was really closely connected to political operation and can be effectively used to explain the historical reality.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examines this point through Wang´s study of the Confucian classis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ies. First the author examines *Du Sishu Daquan Shuo*，*Sishu Xunyi*，*Zhouyi Waizhuan* and other works to explai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mind-nature and political practice as reflected in will（志）、capacity（量）、and knowledge（识）and the concept of "the method of the broad and far-reaching mind". Second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at the learning of mind-nature as reflected in those political practitioners，namely "miniter"，and dicusses the "Way of the Minister". Additionally，the article explores Wang Chuanshan´s thought on the connection of the learning of mind-nature and the "Way of the Minister" in his classical studies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y，and the close correlation to his unforgettable political experience in South Ming dynasty during Yong Li period.

中国古代政治的结构由君、臣、民所构成。作为最高权力的唯一的君，其一言一行自然是一人而可影响天下。明末清初王船山在其史论《读通鉴论》、《宋论》中高度评价汉光武帝、唐高祖、宋太祖，并论君"心"之重要。而作为君与民之间的臣，即士大夫群体，是政治的实际操作者，大臣更在其中起关键性的作用。船山指出，"国必有所恃以立。大臣者，所恃也"[①]，"无人者，无大臣也"。[②]士由学而仕，可达及大臣。"社稷之臣"、"大臣"以及"大臣之道"成为船山史论中、同时也是其经解中极为关键的提法。他在具体的历史中严格辨析"允为大臣"者，"不足为社稷臣"者，得、实未得"大臣之道"者。平常

［收稿日期］2010－09－01
［作者简介］谢茂松（1963—），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执行编辑、编辑部主任

人们普遍认为的名臣，包括《资治通鉴》在内所推重的名臣，往往并不被船山所认同。例如船山认为西汉以经术著称的萧望之，唐李绛、裴度，甚至北宋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司马光都不足为大臣，而辨其不尽然之实。他所认为的“允为大臣”者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仅有如东汉末之傅燮、三国吴之顾雍、东晋郗鉴、唐狄仁杰、北宋李沆、明刘健等。船山一再感叹“大臣之不易任”[③]，正是“社稷之臣”、“大臣”这一船山独特的提法，以及这一提法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落实，提供了进入到船山对中国政治省察的核心处的可能。由于“大臣”任天下之重，大臣之品格则需要极高的要求，这即是船山所提出的“大臣之道”。

在讨论船山的“大臣之道”之前，先讨论他对与“大臣”相对的功名之士、直谏之臣、虔矫之吏、清高之士、疏庸之士、妄人、意气之士、躁人、鄙陋之庸臣、矫诡之士、游士等其他几类士人、臣子的批评，以见士人种种易犯之过，从而在儒家所要求的政治成熟方面对士大夫群体作出自我反省。同时也在比较中见“大臣”之不易为，见大臣之难得，阐明政治所需要的最高的实践智慧，这也是船山所强调的士的自我要求。

船山早年三十八岁所作《黄书》，后期六十四岁所作《噩梦》，是从制度层面全面反省明亡的经验教训，而到他临终前七十三岁所完成的《读通鉴论》、《宋论》则由制度而更多转向到对创设制度之用心、身处制度中的人、运用制度的人的关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成为政治的极则。思考实际的政治操作所需要的品格、能力变得至关重要。船山本人也由激进转到持重。

本文的讨论将以船山的史论《读通鉴论》、《宋论》为中心，他在《读通鉴论·叙论》中解释了为何用史论的形式，他说“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④]船山史论如其经解，辨析曲折而精微，故不多录其文字则无以见之。

一、对历史上各种士人、臣子的辨析与批评

1. 功名之士

一谈到政治，人们往往容易想到功名之士，而这也是为政者最容易选择的方式。

西晋末年，刘琨深怀忠愤，以志匡中国。他为讨刘渊而进索虏，船山由此批评他是“拒一夷而进一夷”，结果事终于不成，“徒延拓拔猗卢于陉北”。船山指出刘琨当时确实很困难，他不能驱市人以敌大寇，但他认为君子行为有其限度。他说“然君子之自靖以忠于所事，亦为其所可为而已矣。智索力穷，则归命朝廷，如魏胜、辛弃疾斯亦可矣，未有急一时而忘无穷之祸者也。”船山由此批评刘琨只是功名之士，志在功名而不闻君子之道，所以功不遂、名不贞，实乃自贻之。船山更叹息刘琨为“不虑之臣”而乱天下，国速亡，夷、夏之防而永裂。[⑤]

唐李德裕抱有为之志欲抒于国。当时宦官内外擅权已成积重难返之势，李德裕为行其志而委屈交接宦官。船山这样分析李德裕之心理：李德裕自以为他能不为宦官用而能用宦官；他对于宦官杨钦义之内召，无所屈节，而以宝玩厌其欲，他固然可以说“此以待小人而使忘机，非辱也。吾行吾志，何恤于硗硗皎皎之嫌疑乎？”但他于君子立身之大防，则最终玷污了。船山理解李德裕所处无道之世之难，并提出应对之方：“洁己无可羡之赀，谋国无偏私之党，以君命而接之以礼，秉素志而持之以正，进不触其深忌，退不取其欢心，俟时以得君，而无求成求可之躁愿，庶其免乎！”[⑥]船山批评李德裕只是功名之士，不足以做到“持之以正”，“无求成求可之躁愿”，这与对刘琨的批评是一样的。

2. 直谏之臣

士人、百姓最喜欢对直谏之臣大加颂扬。

三国魏虽多直臣，却无人虑及已经深伏的司马懿之祸而向魏主曹睿进言。船山分析是魏之士或不知，知而或不言，或知之而不深，言之而不力。但当时司马懿并没有死党，也没有荣人、杀人之威福，魏之士却无能尽底蕴以告

诉魏主，船山剖析其中原因，是这些魏士“心不存乎社稷，浮沉之识因之不定”，故未能剖心刻骨为曹氏徘徊四顾而求奠其宗祏。船山一再感叹：“得直谏之士易，得忧国之臣难！”他将以社稷为忧者譬作是操舟于洪涛巨浸：“脉察其碛岸洑涡之险易，目不旁瞬而心喻之；则折旋于数十里之外而避危以就安也，适其所泊而止”，这并非是舟工之智若神禹，而是“心一于是而生死守之尔”。[7]值得注意的是，船山在这段史论中以“心”与“识”为原则来批评直谏之士。

唐太宗有“未能受谏，安能谏人”一语，船山赞扬这是“知本之论”。他指出，凡是能极言以谏者，大抵是其气胜：“自信其是，而矜物以莫及，物莫能移者也。其气胜，则其情浮；自矜而物莫能移，则其理窒”，由此则最终不能指望其能影响人主。能自受谏者，则能虚其心，广其明。惟明则诚，诚则动。谏者能如此者甚少，船山指出：“位不可恃，气不可任，辩不可倚，理不可挟”，而“平情好善、坦衷逊志者，早有以动人主之敬爱，而消僚友之疾忌”。反之：“婞直予智，持一理以与当宁争得失”，则很难不启朋党而坏国是。[8]

3. 虔矫之吏

虔矫之吏鸷击富豪，而合于小民之仇富心理，故而为小民所称道，但却为船山所批评。他批评汉宣帝时赵广汉之所为：“流俗之毁誉，其可徇乎？赵广汉，虔矫刻核之吏也，怀私怨以杀荣畜而动摇宰相。国有此臣，以剥丧国脉而坏民风俗也，不可复救。乃下狱，而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流俗趋小喜而昧大体，蠭涌相煽以群迷，诚乱世之风哉！小民之无知也，贫疾富，弱疾强，忌人之盈而乐其祸，古者谓之罢民。夫富且强者之不恤贫弱，而以气凌之，诚有罪矣。乃骄以横，求以忮，互相妨而相怨，其恶惟均。循吏拊其弱而教其强，勉贫者以自存，而富者之势自戢，岂无道哉？然治定俗移而民不见德。酷吏起而乐持之以示威福，鸷击富强，而贫弱不自力之罢民为之一快。广汉得是术也。任无藉之少年，遇事蠭起，敢于杀戮，以取罢民之祝颂。于是而民且以贫弱为安荣，而不知其幸灾乐祸，偷以即于疲慵，而不救其死亡。”

船山叹息“流俗之惑人，千年而未已，亦至此乎”，他又以百姓称道的北宋包拯为虔矫之吏，并谓“包拯用而识者忧其致乱，君子之远识，非庸人之所能测久矣”。[9]

4. “清孤之士”

士人颇多清高，以不为国用为尚，船山批评其导致坐失可为之机，导致国中无人之大害。他感叹：“惜天下之不治者，曰有君无臣”，其涵义是：“诚有不世出之君矣，岂患无臣哉！所谓有君者，君在中材以上，可与为善，而庸谫之臣，无能成其美而遏其恶也。”船山认为汉顺帝就是如此。汉顺帝“非不智”、“非不仁”、“非不断”、“非不明”，当时若真能有臣的话，则汉朝是有可能重新振起的，但当时在位之人才如桓焉、朱宠、朱伥之流，皆“衰病瓦全，无生人之气，涂饰小康，自寡其过，不能取百年治乱之大端谨持其几。而左雄、虞诩因事纳忠之小器，遂为当时之杰。”结果“帝德不终，而汉衰不复”，无臣乃是其中的深层原因。

造成无臣的原因，船山分析有二：“摧之，激之。成于女谒、宦竖、佥人之持权者则一也。”受摧折而不克振者：“仰虽忧国，俯抑恤己，清谨自持，苟祈免于清议，天下方倚之为重，而不知其不足有为也”，桓焉、朱伥之流属于此。其激焉而为已甚者，又有二：一种是“愤嫉积于中，而抑采草野怨讟之声以求快于愚贱，事本易而难之，祸未至大而张之，有闻则起，有言必诤，授中主以沽直之讥，而小人反挟大体以相难”，李固、陈球之徒属于此。另一种则是清孤之士，他们“伤宿蠹之未消，耻新猷之未展，谓中主必不可与有为，季世必不可以复挽，傲岸物表，清孤自奖，而坐失可为之机”，黄宪、徐љ、陈寔、袁闳之徒属于此。

“激而争者”，在船山看来是“详于小而略于大，怒湍之水，不可以行巨舟”。激而去者，则“决于弃世而忍于忧天，环堵之光，不可以照广野”。他认为这些人皆非不可康济之才，而不终其用。此乃由来已久，而非一旦一夕之故。他惋惜虽有可与为善之君，而终无与弘奖而利成之。[10]

唐宣宗之世亦国中无人，而国无可用之人

则必亡。船山指出，国之无人，不只是其君不欲用之，也是欲用之而固无人。铮铮表现者，不是迂不适用，就是小有才而不足任大，如此不得谓之有人。当时并非天地吝于生才以亡人之国，秉道行义、德足以回天者，间世而一出，自然不能指望其一定有，可是“贤智之士，宅心无邪，而乐为君用，则亦足以匡乱救亡，功成事定，而可卓然为命世之英，此则存乎风尚之所移耳”。所以国之无人，在船山看来：“惟贤智之士不为国用，恬然退处以为高，以倡天下，置君父于罔恤，于是乎国乃终以无人。”

船山进一步分析一二贤智之士不为国用，何以能至国中无人之原因：“夫一二贤智之士不为国用，而无损于当世，似未足以空人之国，使忘君父也。乃唯贤智之士，立身无瑕，为谋多臧，天下且属望之，而以不为国用为道，其究也，置其身于是非休咎之外，天下具服其卓识，而推以为高；于是知有其身以求免于履凶蹈危者，皆慕其风，以为藏身之固，则宗社安危生死一付之迂愚巧黠之人；而自好者智止于自全，贤止于不辱，志不广，学不博，气不昌，乃使数十年内，尽士类皆成乎痿痹泮涣之习；自非怀禄徼幸、依附乱贼而不惭者，皆不可与有言、不可与有为之人也。于是乎天下果于无人。而狐狸昼嗥，沐猴衣锦，尚谁与治之哉?”

船山以上史论乃是基于唐宣宗时韦澳对其甥之言语这一史事：“宣宗之世，上方津津然自以为治也。而韦澳谓其甥柳玭曰：‘尔知时事浸不佳乎？皆吾曹贪名位所致耳。’是其为言，夫非贤智者之言乎？于是上欲以澳判户部，且将相之，而浩然乞出镇以引去。盖澳之不为唐用，非一日矣，周墀入相，问以所可为，则曰：‘愿相公无权。’宣宗屏人语以将除宦官，则曰：‘外廷不可与谋。’其视国家之治乱，如越人之肥瘠，而以自保其身者，始终一术也。”⑪

5. “疏庸之士”

南宋李纲多次给宋高宗上书，天下后世乐以道之，无议其非者，而是批评高宗之不用，船山独能言人所未言地批评李纲之奏疏，欲“建立纲宗、统万殊万目于数纸之中”，实为“虚设之纲宗，固无当也”，由此谓李纲为“疏庸之士”。

真正的“言之纲宗”，在船山看来是：“言有纲，道有宗；纲宗者，大正者也。故善言道者，言其宗而万殊得；善言治者，言其纲而万目张。循之而可以尽致，推之而可以知通，传之天下后世而莫能擿其瑕璺。然而抑必有其立诚者，而后不仅以善言著也，且抑必听言者之知循知推，而见之行事者确也。抑亦必其势不迫，而可以徐引其绪；事不疑，而可以弗患其迷也。如是，则今日言之，今日行之，而效捷于影响。”船山批评天下之尚言者，不如是以言者甚多：“疏庸之士，剽窃正论，亦得相冒以自附于君子之言；宗不足以为万殊之宗，纲不足以为万目之纲，寻之不得其首，究之不得其尾，泛然而广列之，若可以施行，而莫知其所措。”

宋高宗南渡后，李纲屡屡进言，其言之为纲宗者有：“报君父之仇也，复祖宗之宇也。又进而加详焉，远小人，亲君子也；议巡幸，决战守也；择将帅，简兵卒也；抚河北，镇荆、襄也。”李纲之言看来全都无可非议，按他所言，循之推之，以建中兴之业，“允矣其无瑕璺矣”，但船山认为，若以实求之，则其进言不足以当纲宗，因此逐条批驳。船山对于李纲奏疏之批评、辨析极见精义，足以让士人深省而类推，举一而反三，故不嫌其长，摘录如下。

就“报君父之仇也，复祖宗之宇”这一条，船山驳此为空言：“君父之痛，土宇之蹙，诚不容已者。然其容已与不容已，系乎嗣君之志而已。有其志，不待言也；无其志，言无益也。有其志而不知所以为之，弗示以方，固弗能奖也。故此二言者，人皆可言，人皆可信，而究止于空言也。进而加详，则固愿终其说以导之而出于迷涂，天下后世之所乐听，或亦高宗之所欲闻乎！”

就“远小人，亲君子”这一条，船山批评其未列君子、小人之具体名字而可能使君子小人之际相混淆：“就其云亲君子，远小人，尚矣。苟非清狂不慧者，孰以为不然？乃君子小人，有定名而无定指者也。以小人为君子，而君子矣；以君子为小人，而小人矣。故诸葛

出师表必目列其人以当之。今不直简贤而求其进，斥奸而请其退，则奚以知汪伯彦、黄潜善之非君子，而赵鼎、胡寅之非小人邪?”

就“议巡幸，决战守”这一急切之条，船山批评其未有精密的具体筹谋：“议巡幸，决战守，急矣。而行伍之凭藉，孰为干城？强敌之争趋，何从控御？刍粮何庤以不匮？器仗何取以求精？岂天子匹马以前，疲卒扶羸以进，遂足定百年之鼎，成三捷之功乎?”

就“择将帅，简兵卒”这一紧要之条，船山批评其只是虚悬口号：“择将帅，简兵卒，尤其要者。抑就莅戎行而数奔者择之邪？无亦求之偏裨，求之卒伍，求之草泽而择之邪？天子自择之邪？纲可代为之择邪？天子自择之，则亦非不有所任用矣。纲可代择之，则胡不心维口诵于坐论之下，如赵普之为太祖谋者，而但虚悬一择之之号，以听人之诡遇乎？惊奔之余，兵卒之不足久矣。集之必有其方；部之伍之，必有其制；教之练之，督之绥之，必有其将。河北之南来，闽海、楚、蜀之新募，必有其可使战可使守之势。合其散而使一，振其弱而使强，必有其道。”船山指出，李纲诚能以一身任安危之寄，则应当“躬任之，默识之，日积月累，以几于成”，而非“大声疾呼，悬一榜、下一令之所能胜也。则尤不可以空言效也”。

就“抚河北，镇荆、襄”这一刻不容缓之条，船山批评其未能就事而谋之：“抚河北，镇襄、邓，诚形势之不容缓矣。河北之待抚，岂徒号于上曰‘吾不割也’，众志遂以成城乎？其吏民为朝廷守者，孰可任也？孰未可任，而急须别拣将帅以任之也？张所、傅亮固未足以胜任，即令任之，而所以安所、亮而使尽其力者何术也？襄、邓之财赋兵戎，其可因仍者何若？其所补葺者何从？专任而无旁挠者何道？凡此，皆就事而谋之，因势而图之，非可一言而据为不拔之策。”

李纲当做的，在船山看来是密藏、研几：“国政在握，成败在于目睫，迫与天子谋之，进群策以酌之，固有密藏于夙夜而研几于俄顷者，岂建鼓而亡子可追哉?”而李纲却“但琅琅乎其言之矣。一言而气已竭矣”，由此难免不被奸党笑之为“是老生之常谈，谓饥当食，而为无米之炊者也。恶足以拯吾君于危殆而措之安哉?”当时的形势是徽宗、钦宗二帝被俘，自河朔以向江、淮，数千里城空野溃，船山批评道：“以一身系九鼎之重，则宜以一言而析众论之归。犹且组练篇章，指未可遽行之规画，以祈免乎瑕璺。”他指出当时非贾谊、董仲舒所处汉盛之时，可以高论以立令名，所以“言之善者，不如其无言”。

船山将“宋之所以浸弱浸削至于亡者”的原因归结于“始终一纲宗之言，坐销岁月而已”，并进而批评李纲之前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之后真德秀等有宋一朝之献策者都有与李纲一样的毛病：“继纲而献策者，杨中立、胡敬仲犹是也。后乎此而陈言者，刘共父、真西山犹是也。乃前乎此而倡之者，景祐以来，吕、范诸公以洎王介甫之邪僻，苏子瞻之纵横，无非是也。以拟诸道，皆提其宗；以考诸治，皆挈其纲；孰得指其瑕璺者？而求其言之即可行，行之即可效者，万不得一焉。故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不怍者，可正告于天下后世，而不违于纲宗之大正者也。叩其所以为之而不得，则难矣。夫言也，而仅以祈免于怍也与哉?”

船山最后将李纲之奏议与唐陆贽奏议之“一议为一事”之为善言作一比较：“陆敬舆以奏议辅德宗，而反奉天之驾，一议为一事而已，非建立纲宗、统万殊万目于数纸之中也。斯则诚为善言者乎！”⑫

6. 妄人

与对李纲上书宋高宗的精微批评相近的是，是船山对王安石入对神宗之言的批评。王安石之入对，首先以大言震神宗。神宗问：“唐太宗何如?”王安石则对道：“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又说：“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彼魏徵、诸葛亮者，何足道哉?”船山批评王安石之言是“言有大而无实”，而“无实者，不祥之言也”。而“明主”知之：“知其拓落而以是相震，则一闻其说，而屏退之唯恐不速”。

由王安石之言，“望而知其为妄人”，船山以为这并不难辨，他辨析道：“使安石以此对扬于尧、舜之廷，则靖言庸违之诛，膺之久矣。抑诚为尧、舜，则安石固气沮舌噤而不敢

以此对也。夫使尧、舜而生汉、唐之后邪，则有称孔明治蜀、贞观开唐之政于前者，尧、舜固且揖而进之，以毕其说，不鄙为不足道而遽斥之。何以知其然也？舜于耕稼陶渔之日，得一善，则沛然从之。岂耕稼陶渔之侣，所言善言，所行善行，能轶太宗、葛、魏之上乎？大其心以函天下者，不见天下之小；藏于密以察天下者，不见天下之疏。方步而言趋，方趋而言走，方走而言飞；步趋走犹相近也，飞则固非可欲而得者矣。故学者之言学，治者之言治，奉尧、舜以为镇压人心之标的；我察其情，与缁黄之流推高其祖以树宗风者无以异。”船山假设尧、舜生于汉、唐之后，对于有称孔明治蜀、贞观开唐之政于前者的揖而进之的态度，以此来批驳王安石方走而言飞，奉尧、舜以镇压人主之心，确乎精微。

船山将王安石之大言与韩愈之言尧舜一体而论，而施以批评：“韩愈氏之言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相续不断以至于孟子。愈果灼见其所传者何道邪？抑仅高举之以夸其所从来邪？愈以俗儒之词章，安石以申、商之名法，无不可曰尧、舜在是，吾甚为言尧言舜者危也。”他甚至将王安石之凌躐、无忌惮与商鞅之术联系到一起：“（王安石）顾乃取前人经营图度之苦心以拨乱扶危者，而凌躐之，楬然曰：‘尧、舜之道至易而无难，旦夕致也。’商鞅之以胁秦孝公者，亦尝用此术矣。小人而无忌惮，夫亦何所不可哉？”船山洞悉王安石扬尧舜之心理：“扬尧、舜以震其君，而诱之以易；揭尧、舜以震廷臣，而示之以不可攻。言愈高者志愈下，情愈虚者气愈骄。”⑬

元稹、白居易被世人认为是唐代进士科取士所得之人才，二人见知于当时的大臣裴度，亦为正人君子所嘉奖，却被船山视为“妄人”。船山先对元、白二人所擅长之言作肯定：“观其应制之策，与登科以后慷慨陈言，持国是，规君过，述民情，达时变，洋洋乎其为昌言也。而抑引古昔，称先王，无悖于往圣之旨，则推重于有道之士而为世所矜尚，宜矣。推此志也，以登三事，任密勿，匡主而庇民，有余裕焉。”但此二人获大用后，卞躁诪张：“汇引匪人以与君子相持而害中于国”。船山由此指出二人非其言之有过，善观人者，不用等到其败德之已章，而早已信其然，如何能明其然，船山洞悉了二人之欲望之满足这一点：“此数子者，类皆酒肉以溺其志，嬉游以荡其情，服饰玩好书画以丧其守。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则不足以厌其所欲。而精魄既摇，廉耻遂泯，方且号于人以为清流之津径，而轻薄淫泆之士乐依之，以标榜为名士。”二人既是如此，而能自树立以为君之心膂、国之桢干、民之荫藉者，万不得一。船山由此乃谓二人，不用等到最后，而知其为“羊膻蚁智之妄人”。⑭

7. 意气之士

西汉末之鲍宣被船山批评为是气激之士。鲍宣向汉哀帝上奏，言民有七亡七死，陈述汉必亡之危险以儆戒哀帝，因此为后世所称颂。船山说这固然是正本之论，但其言犹有弊病，他认为后世言事之臣，增闇主之疑而授奸臣以倾妒之口实，皆与此有关。鲍宣说：“慎选举，大委任，以儆官邪，而免民于死亡”，船山批评其言透露出天子不能掌握用人之权，如此则“逼上有嫌，而朋党之谤兴”。更何况鲍宣所称道者亦未见有大臣之操，甚至孔光为巨奸而许之于清流，实可谓失言。船山批评鲍宣进言者不知其道，为“一时气激之士”，而不足以胜任匡主庇民之重任。⑮

船山以同样的理由批评东汉蔡邕为“意气之士”，其始而以危言召祸，终而以党贼逢诛，都是一往之意气之为，自私而不负责任。⑯

8. 躁人

西汉周勃平诸吕，迎立文帝，而有得意之色，船山认为他并没有有罔上行私之慝，只是不学无术而忘其骄而已，而袁盎与周勃有同寅之义，倘若对周勃加以规正的话，周勃岂能遽怙而不改，而他在未对周勃作任何规正之下，却告文帝曰：“丞相骄，陛下谦让，臣主失德。”船山指出，此言一出而衅忌生，周勃之祸早伏而不可解，可谓凶险。船山进而对“击于目即腾于口”之“躁人”作出批判：“乃抑有奸不如盎者，浅而躁，褊迫而不知大体，击于目即腾于口，贻祸臣主，追悔而弗及，非盎类而害与盎等。故人主之宜远躁人，

犹其远奸人也。则亲亲尊贤之道，其全矣乎！”⑰

汉文帝时，吴王欲反，后世皆推崇贾谊、晁错之忧心而日夜筹划，船山则表彰文帝持之定而能待，而贾、晁二人不能测文帝其中之所持，急而不能待，他就此述析、比较文帝与贾、晁二人之能待与不能待：

> 文帝崩年四十有六，阅三年而吴王濞反。濞之令曰：“寡人年六十有二。”则其长于文帝也，十有三年。当文帝崩，濞年五十有九，亦几老矣。诈病不觐，反形已著，贾谊、晁错日画策而忧之。文帝岂不知濞之不可销弭哉？赐以几杖而启衅无端，更十年而濞即不死，亦以衰矣。赵、楚、四齐，庸劣无大志，濞不先举，弗能自动。故文帝筹之已熟，而持之已定。文帝幸不即崩，坐待七国之瓦解，而折箠以收之。是谊与错之忧，文帝已忧之。而文帝之所持，非谊与错所能测也。
>
> 吉凶之消长在天，动静之得失在人。天者人之所可待，而人者天之所必应也。物长而穷则必消，人静而审则可动。故天常有递消递长之机，以平天下之险阻，而恒苦人之不相待。智者知天之消长以为动静，而恒苦于躁者之不测其中之所持。若文帝者，可与知时矣。可与知时，殆乎知天矣。知天者，知天之几也。夫天有贞一之理焉，有相乘之几焉。知天之理者，善动以化物；知天之几者，居静以不伤物，而物亦不能伤之。以理司化者，君子之德也；以几远害者，黄、老之道也；降此无道矣。

船山据此而批评贾、晁二人“恃其一罅之知，物方未动，激之以动。激之以动，而自诧为先觉。动不可止，毒遂中于天下，而流血成渠。国幸存，而害亦憯矣”，他因此强调有一罅之知者，慎密以俟之，毋轻于言，而天下之祸可以息。⑱

9. 鄙陋之庸臣

西汉宣帝时，赵充国抗击羌人进犯，宣帝下诏充国：“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数岁而胜敌，将军，谁不乐此者?”船山批评此乃“鄙陋之臣以惑庸主而激无穷之害”，幸而赵充国坚持而不为动，否则，汉就危殆了。船山就此辨析鄙臣、庸主，司农、有司、将帅以及猾胥、疲民欲速已之害：“为国者，外患内讧，不得已而用兵。谓之不得已，则不可得而速已矣；谓之不得已，则欲已之，亦惟以不已者已之而已矣。何也？诚不可得而已也，举四海耕三余九之积，用之一隅，民虽劳，亦不得不劳；国虽虚，亦不得不虚。鄙陋之臣，以其称盐数米于烓厨之意计而为国谋，庸主遂信以为忧国者，而害自此生。司农怠于挽输，忌边帅之以军兴相迫，窳敝之有司，畏后事之责，猾胥疲民，一倡百和，鼓其欲速之辞，而害自此成。茫昧徼功之将帅，承朝廷吝惜之指，翘老成之深智沉勇以为耗国毒民，乃进荡平之速效，而害自此烈矣。”

赵充国实际上只持之一年而羌以瓦解，则之前他所说欲以数年而胜敌的话，乃是“老成熟虑之辞，抑恐事不必速集，而鄙陋之庸臣且执前言以相责耳。非果有数岁之费以病国劳民，显矣。”船山感叹期速效而亡天下之害：“甚矣，国无老臣而庸主陋臣之自误也！惮数岁之劳，遽期事之速效，一蹶不振，数十年兵连祸结而不可解，国果虚，民果困，盗贼从中起，而遂至于亡。以田夫贩竖数米量盐之智，捐天下而陆沈之，哀哉！”⑲这段议论背后乃是明末上下都对剿流寇、征辽东，期速效而招致亡国之沉痛教训。

10. 矫诡之士

西汉昭帝时严延年劾奏霍光擅废立、无人臣之礼。表面看来，“其言甚危，其义甚正，若有敢死之气而不畏强御。或曰：光行权，而延年守天下之大经，为万世防”，船山批评严延年安能得此不虞之誉，他充分洞悉延年熟虑沽直而不会有祸的隐秘心理：“其后霍氏鸩皇后，谋大逆，以视光所行为何如，延年何以噤不复鸣邪？光之必有所顾忌而不怨延年，宣帝有畏于霍氏，必心利延年之说而不责延年，延年皆虑之熟矣。犯天下之至险而固非险也，则乘之以沽直作威，而庸人遂敬惮之。既熟虑诛戮之不加，而抑为庸人之所敬惮，延年之计得矣。前乎上官桀之乱，后乎霍禹之逆，使延年一讦其奸，而刀锯且加乎身，固延年所弗敢问也。”

船山于是总结“矫诡之士”每每翘君与大臣危疑不自信之过，“言之无讳以立名，而早计不逢其祸”，此正所谓“言辟而辨，行伪而坚”者，船山指出“有所击必有所避，观其避以知其击，君子岂为其所罔哉?”[20]

11. “游士”

对于游士，船山极尽批评之辞。他认为游士即便不乱人国，也不足以系国之重轻，因为民望所不归。[21]他更以唐末宪宗时谭忠持两端之策而为藩镇谋划之史事，而激烈批评游士之乱天下。船山析述这段史事道：“揣摩情势、游移捭阖之士，其术得雠，而天下之乱不可止。战国之分争，垂数百年而不定，暴骨连野，人之死者十九，皆此等心机所动，持天下而徇己说者成之也。至于唐之季世，而游士之口复腾。河北兵连，宇内骚扰，一言偶中，狂夫捐久长之利害，而一意徇之，险矣哉！若谭忠之为田季安、刘济谋者是已。于斯时也，为季安谋万全者，岂有他哉?陈王承宗之逆而必败，淮蔡、淄青之自速其亡，使二镇合兵，蹙承宗使就缚归命，改镇修职，则季安、济长保其富贵；而承宗既禽，淮蔡不敢穷兵以抗命，淄青不敢仗盗以党奸，天下亦蒙其安平之福矣。其后田弘正一逼郓州，而李师道旋授首于刘悟，其明效矣。而谭忠持两端之策，揣朝廷之举动，姑顺天子之命，实保承宗之奸，以上免朝廷之怒，下结叛逆之心，自谓谋之已工，而昧于久长之计者，惊其揣度之中，无定之衷，固不胜其如簧之舌，于是取堂邑以市交，收饶阳、束鹿以谢咎，二镇固可处堂而嬉也。而天下之祸，乃以此而深。”船山认为假如没有谭忠的话，则“二镇顺而归命，一言而决耳；逆而助贼，亦一言而决耳；痈已溃，收之而固无难也。故曰忠之为谋险矣哉！”

船山强调“士之倾危而祸及天下者，莫甚于善揣中外之情形而持之不失”，他对于游士的激烈批评态度背后乃是历史上游士多次引夷狄而亡华夏之沉痛教训：“李巨川之亡唐，张元、吴昊之乱宋，皆此也。杜荀鹤、韦庄之流，始于容身，终于幸利，然技止于雕虫，犹不尸为戎首。而兀术欲走，一书生揣岳、秦之衅，言如持券，以终陷东京而不复。”

针对游士之害，船山提出仍修庠序、不辍贡举的应对之方：“当国者之御此曹也难矣，奖之则群起而挠国是，抑之则反面而事寇仇。惟当祸乱繁兴之日，庠序仍修，贡举不辍，使有坦道之可遵，而旁蹊庶其可塞乎！将帅不得荐幕士，督府不得用参谋，亦拔本塞源之一道也。”[22]他强调“先王收之于胶庠，而奖之以饮射，非以钳束之也，凡以养其和平之气而潜消其险诈也。”[23]

以上对各种士的批评，可见船山在其《读通鉴论·叙论》所说“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尽然之实，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而轻重别，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24]士人、百姓所推崇、乐道者被船山施于批评：怀忠愤之刘琨被批为功名之士，包拯被批为虔矫之吏，李纲被批为疏庸之士，王安石奉尧舜被批为妄人，元稹、白居易亦被斥为妄人，上民有七亡七死之章的鲍宣被批为意气之士，忧心吴王之反的贾谊、晁错被批为躁人。船山也指出直谏之臣易得，忧国之臣不易得，清孤之士致国中无人，惜费欲速之为鄙陋之庸臣。他又揭示出矫诡之士之隐秘心理，游士之乱天下，皆言人所未能言，显示出船山对于士大夫群体在政治成熟度方面的自我反省之深刻。

二、大臣与大臣之道

在讨论了船山对于各种士的批评之后，接下来对于大臣、大臣之道的讨论则更易见大臣之难得。船山常会用到不可以为大臣、“允为大臣”、实未得大臣之道、得大臣之道这类说法，值得深究。

（一）大臣必入参坐议，出接四方；大臣当制治于未乱；大臣当有独行其志之定识；大臣能静正而徐理溃决之社稷

大臣之为大臣，在船山看来，是大臣必须能入参坐议，出接四方；大臣当制治于未乱；而当“宗社之所以安，大臣之所以定，奸邪窥伺于旁，主心疑贰于上，事机决于俄顷，祸福分于毫厘”之际[25]，大臣则当有独行其志之定识；大臣还当能静正而徐理溃决之社稷。以下就这四点作一讨论。

唐宪宗时，藩镇割据，大臣李绛谋国征验

疾速“大臣藩镇割据，魏博田季安死，其子擅立，李吉甫请讨之，而李绛请俟其变。筹之堂上而遥制千里，度之未事而验之果然，不两月而田兴果请命奉贡，效其忠贞，一如绛言，不差毫发。古今谋臣策士，征验疾速，未有如此之不爽者也。”船山细致地分析李绛如何秘密接纳边臣田兴，李绛“自策之，自言之”，如此而何忧事不成。船山据此提出，大臣之以身任国事，必须熟识天下之情形，接纳边臣之心腹，与四方有肺腑之交，密计潜输，尽获其肝胆，乃可以招携服远。他强调以一人之忧为忧，以天下之安危为安危者，“岂孤立廷端，读已往之书，听筑室之谋，恃其忠智而无偾事之虞哉?”

大臣之谋国既是如此，船山进而指出，天子之命相，倚之以决大疑、定大事，亦必有方，即必使其入参坐议、出接四方：“殿阁之文臣，既清孤远物，而与天下素不相接；部寺之能臣，钱谷刑名杂冗，而于机事有所未遑；危疑无定之衷，竭智以谋，愈详而愈左。故人主之命相，必使入参坐议，出接四方，如陆贽、李绛之任学士也，早有以延揽方镇而得其要领；天下亦知主眷之归，物望之集，可与为因依，而听其颐指；无患乎事机之多变，而周章以失据矣。”船山批评人主“不能知人而厚防之，严宰执招权之罚，禁边臣近侍之交，以漠不相知之介士，驭万里之情形，日削日离，待尽而已矣。”[26]与此相关的，船山还多处提到大臣要久任，而不能经常更替。

在船山看来，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乃可以为天子之大臣。他认为唐肃宗时李泌足以当之。他述析其谏肃宗以元帅授太子广平、勿授有英果之姿之建宁，从而全二王兄弟之恩的事迹：“其与肃宗议功臣之赏，勿以官而以封邑，故贼平而无挟功以逼上之大臣，此之谓保邦于未危。不然，则如刘裕之诛桓玄，李克用之驱黄巢，社稷随之以倾矣。其谏肃宗以元帅授广平、勿授建宁也，故国储定而人心一。全二王兄弟之恩，息骨肉猜疑之衅，此之谓制治于未乱。不然，则且如太宗宫门流血之惨，玄宗太平构祸之危，家国交受其伤矣。”

船山就假设肃宗以元帅授建宁之可能后果作分析，从反面以见天子之贵有大臣者为何：“太原之起，秦王谋定而乃以告；韦氏之诛，临淄不告相王而行；非适非长而独建大功，变起宫庭，高祖、睿宗亦无如之何也，非君父之舍适长而授庶少以权也。使肃宗以元帅授建宁，则业受命于己矣，是他日之争端，肃宗自启之也。乃肃宗之欲命建宁，非有私宠之情，以建宁英果之姿，成功较易，则为当日平贼计者，固得命帅之宜，廷臣自以为允。乃长源于图功之始，豫计未有之隙，早涂墍以泯其迹，决之一言，而乱萌永塞，所贵于天子之有大臣者，唯此而已矣。事已舛，祸已生，始持正以争于后，则虽以身殉，国家不蒙其佑，奚足赖哉?”

船山接着述析广平虽才让建宁，为帅终建大功，以此证明李泌之知深虑远可以为大臣：“且夫逆贼有必亡之势，诸将有克敌之能，广平虽才让建宁，亦非深宫豢养无所识知者也。假元子之宠灵，为将士先，自可制贼之死命，无待建宁而始胜其任，长源知之审矣。广平为帅，两京旋复，亦非拘名义以隳大功。知深虑远，与道相扶，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谓也。故曰必如是而后可以为天子大臣也。”[27]

集思广益，而功不必自己立，这自然是大臣之道，船山指出也有不尽然者，非光大宅心而忠忱不渝者不能知之。船山提出事机决于俄顷的状况下，大臣当离人而任独：“若夫宗社之所以安，大臣之所以定，奸邪窥伺于旁，主心疑贰于上，事机决于俄顷，祸福分于毫厘，则疏远之臣民，既非其所深喻；即同朝共事，无敢立异而愿赞其成者，或才有余而志不定，或志可任而才不能胜。徒取其志，则清谨自矜之士，临之而难折群疑；抑取其才，则妄兴徼利之人，乘之而倒持魁柄。如是者，离人而任独，非为擅也。知之已明，审之已定，握之于幽微之存主；而其发也，如江、河之决，不求助于细流。是道也，伊、周之所以靖商、周，慎守其独知，而震行无眚，夫孰得而与之哉?”船山认为三代以还，能做到这样的，只有北宋历仕仁宗、英宗、神宗的大臣韩琦一人而已。

当时英宗已长大，而母后之帘不撤，宵小持其长短，谤谮繁兴，以惑女主，而英宗之操纵，在其掌中，当时“非独张昇、曾公亮、

赵概之不能分任其死生，即文、富二公直方刚大之气，至此而不充。故‘决取何日’之言，如震雷之迅发，而叱殿司以速撤；但以孤忠托先君之灵爽，而不假片言之赞助。其坐政事堂，召任守忠，斥其恶而速驱以就窜，必不以告赵概，而制之以勿敢异同。”船山感概以如此之事，而咨谋于庶尹，会议于堂皇，腾书于章奏，求其事之不败而不能。他由此赞扬韩琦之独任于己为臣道之极致：“其志之贞，盟于梦寐；其道之正，积于生平；其情之定，忘乎生死；其力之大，发以精神。功何必不自己成，名何必不自己立，而初无居功立名之心，可揭日月以告之天下。易曰：‘或从王事，知光大也。’知光大者之独行而无所恤，乃可以从王事，臣道之极致也。”船山比较后来的赵汝愚未能做到这点，他非韩侂胄不足以立功，但事权却失，虽有朱子，也不能善其后。船山再次强调“无乐取人善之虚衷，不足以经庶务；无独行其志之定识，不足以任大谋。刚愎自用者，及其临事而待命于人。斗筲之器，所受尽而资于瓶盎，必然之势也。”[28]

船山认为唐无静正诚笃之大臣，而甘露之变后为宰相的李石庶几，郑覃则其次，二人之静正诚笃体现于他们作为大臣独能徐理溃决之社稷。他认为二人之受相位而不辞，非乘间以希荣，而是诛夷在指顾之间而有所不避。六巡边使疾驱入京，声言要尽杀朝士以恐喝搢绅，李石“安坐省署以弭其暴横”，此时，李石乃是以腰领妻孥为社稷争存亡，为衣冠争生死，船山赞叹其“可不谓忠诚笃悱、居易俟命之君子乎”。江西、湖南欲为宰相召募卫卒，而李石不许，刺客横行，刃及马尾：“固石所豫知而听之者也”。“薛元赏之能行法于神策军将，恃有石也；宋申锡之枉得以复伸，覃为之也。”船山乃谓“止滔天之水者，因其溃滥而徐理之”，最终宦官仇士良之威不敢逞，文宗得以令终，而武宗能弭其乱，这乃是二人最早开始打下的基础。[29]

（二）大臣当无私心，薄一己之功名

在船山看来，大臣有私心、私利则不足为社稷之臣，私有个人之私，亦有士大夫群体之私。

船山指出“一议也，而以私与其间，则成乎私而害道”，他认为唐、宋以下所称持大体、务远图之大臣，没有不杂公私以议国事者，所以忮主奸臣倒持之以相挠而相胁。他以此批评唐玄宗时之张说回护士大夫群体之私。当时唐玄宗与宰相议广州刺史裴伷先之罪，张嘉贞请杖之，张说说：“刑不上大夫，为其近于君也，且所以养廉耻也。”船山评价其言“韪矣，允为存国体、劝臣节之訏谟”。张说既而又说：“宰相时来则为之，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辈。”船山批评此语与宋人“勿使人主手滑”之说相同，而苟怀“行及我辈”之心，与同官噂沓以语，以倡此说，传之上下，垂之史策，人主将会说：士大夫自护其类以抗上而避害，乃是古今之通习，其所谓存国体、奖士节，都是假托之辞，而不可信。

船山指出士之可杀不可辱者在己，而非挟持以觊上之宽我于法，而“居之以淡泊，行之以宁静，绝贿赂之门，饬子弟之汰，谢游客之邪，息党同之争，卓然于朝右，而奚笞辱之足忧?”他又指出，若诚然有过，则引身以待罪；言若不为君用，则辞禄以归耕。[30]

船山认为宋之盛时“其大臣之表见者，风采焕然，施于后世，繁有人矣”，而“责以大臣之道，咸有歉焉”，他们并非是非不明，并非效忠之不挚，并非学术之不正，并非操行之不洁，而是“恒若有一物焉，系于心而不能舍。故小人起从而蛊之，已从而玩之，终从而制之；人主亦阳敬礼而阴菲薄之。无他，名位而已矣。”[31]此论乃是基于北宋真宗时王旦之史事。王旦居宰辅之位，系国之安危，而奸臣王钦若、丁谓、陈彭年之徒，侧目其去，以执宋之魁柄。王旦迟回隐忍，为王钦若祥瑞之说所持。船山分析王旦之所以能被王钦若所持，乃是王钦若料到王旦不能舍相位。王旦之用为宰相乃是缘于寇准的被罢相。船山由此提出假如王旦于命相之日，力争寇准之去，而不肯代其位，则王钦若之奸不摧而自折。

与对宋“责以大臣之道，咸有歉焉”的批评相近的是，船山批评唐“多能臣而鲜端士”，但于张柬之则有取焉。唐中宗初复，薛季昶说：“产、禄犹在，草根复生。”薛季昶将当时的诸武比之于汉时的诸吕。而张柬之不为薛之言所摇动而不诛诸武，欲使天子自诛

之，而谨守臣节，不与天子争威福之柄，以张天子之威。船山由此赞扬其“念深礼谨，薄一己之功名，正一王之纲纪，端人正士所由异于功名之士远矣。”㉜

（三）大臣之平情、坦然无我之大用

李光弼、郭子仪二人在平安史之乱上都立下大功，以战功而论，李光弼奋其智勇，克敌制胜之功视郭为多；郭则一败于清渠，再溃于相州，功较之李显然不如。然而郭子仪却为唐社稷之臣，天下倚以重轻，后世无得而议，船山认为其岂是徒徼虚誉，而这完全在于其“平情”。船山强调任天下之重者，没有比平其情以听物之顺逆，而不挟意以自居于胜更重要的。他高度评价郭子仪“以翘关负米起家，而暗与道合，其得于天者，三代以下莫与之伦矣”。

船山指出有人能任，则不能让，此所谓豪杰之士，以韩信、马援为代表；能让，则不能任，此为保身之哲，以张良、李泌为代表。而郭子仪于“位之崇替，权之去留，上之疑信，谗佞之起灭，乃至功之成与不成，俱至则受之，受则任之，而无所容心于其间。情至平矣，而天下不能测其所为”。船山以山、水来譬喻平情之度量之为大用：“山有陂陀，则测其峰之起伏；水有滩碛，则测其波之回旋；平平荡荡，无高无下，无曲无奇，而物恶从测之哉？天下既共见之，而终莫测之，大哉！平情之为用也，四海在其度中，贤不肖万殊之情归其范围矣。”

李光弼在得郭子仪被肃宗所夺之兵后，奋其智勇，却内乱蜂起，此扑彼兴，而郭子仪重新被起用后天下帖然，船山就此比较二人道：“相州师溃，汾阳之威名既损，鱼朝恩之谮行，肃宗夺其兵柄授李光弼，数年之内，光弼以元帅拥重兵戮力中原，若将驾汾阳而上之也。乃许叔冀叛于汴州，刘展反于江、淮，段子璋反于梓州，楚州杀李藏用，河东杀邓景山，行营杀李国贞、荔非元礼，内乱蠭起，此扑彼兴。迨乎宝应元年，汾阳受王爵、知诸道行营，而天下帖然，内既宁而外自戢，史朝义釜鱼之游不能以终日，弗待血战之功也。”船山继而指出，郭子仪一出而天下熄，其建威不过斩王元振四十余人而已，天下莫敢复乱，他于是感叹：“呜呼！是岂光弼智勇之所能及，汉、魏以下将相大臣之能得于天下者乎？”

郭子仪“唯其平情以听权势之去来，可为则为，不可为则止，坦然无我之大用，人以意揣之而不能得其要领，又孰知其因其心而因物以受宠辱之固然者乎？”当时仆固怀恩为乱人，张用济欲逐光弼，而怀恩说：“邺城之溃，郭公先去，朝廷责帅，故罢公兵。”船山评论其“引咎以安众心，何其似君子之言也”，认为此非郭子仪“安土敦仁、不舍几几之度，沦浃于群心，怀恩讵足以及此哉？”

在关于郭子仪的这条史论的最后，船山精微地分析了人臣所必有之不平之情及其后果，以此显示郭子仪较之李光弼而为“大人”之度量：“人臣之义，忧国如家，性之节也；社稷之任在己而不可辞，道之任也。笃忠贞者，汲汲以谋济，而势诎力沮，则必有不平之情。此意一发于中，必动于外，天下乃争骛于功名，而忘其忠顺。奸人乘之，乱因以起。唯并取立功匡主之情，夷然任之，而无取必于物之念，以与天下相见于冰融风霁之宇，可为者无不为焉，则虽有桀骜不轨之徒，亦气折心灰而不敢动。不言之言，无功之功，回纥称之曰‘大人’，允矣，其为大人矣！以光弼之忠勇不下于公，而天下不蒙其祐，两将相衡，度量较然矣。”㉝

大臣之“平情”体现于听权势之去来，也体现于“恶恶”这一问题上。明初开国功臣刘基自言“疾恶太甚，不可为相”。刘基之言易让人产生疑问，宰相乃是贤不肖之所取裁，以操治乱之枢机者，怎么可以好善不笃，恶恶不严呢？那么，刘基为何要这么说？船山解释道：“太甚云者，非不能姑纵之谓也。谓夫恶之而不如其罪之应得，不待其恶之已著，而擿发之已亟也。”他提出为相臣者，当“平情以审法，持法以立断”，而非“形于色，发于言，无所函藏，而早自知其不容，一斥为快，而不虑其偾兴以旁出也；如是以赞人主赏罚之权，而君志未定，必致反激以生大乱。”船山此论基于唐高宗时长孙无忌之恶奸臣李义府之史事：“长孙无忌之恶李义府，正矣；既熟察其凶险之情，则不宜轻示以机而使之自危。乃不待其罪之著见而无可逃，而遽欲谪之

于蜀徼；抑不能迅发以决行，而使得展转以图徼幸。于是义府之奸，迫以求伸，用王德俭之谋，请立武氏，一旦超擢相位，而无忌不能不坐受其穷。”

船山比较古今正反的例子。他赞扬北宋韩琦之处任守忠“其气不迫，而后其断不疑。函之从容，而决之俄顷，故守忠弗能激出以反噬”。而汉申屠嘉一失之邓通，再失之鼂错，都是因为疾恶甚而无持重之断，以一洩而易穷。他认为刘基之言“为万世大臣之心法，允矣”。[34]

（四）社稷臣者，唯正而已

唐狄仁杰事武则天而终复唐之社稷，一般人都会认为狄仁杰之所以能得武则天之心而唯言是听，树虎臣于左右而武则天没有疑心，他一定是“委曲以用机权”，以得当于武氏，而后使为己用。船山认为考证于狄仁杰之生平，完全不尽然 “当高宗时，方为大理丞，高宗欲杀盗伐昭陵柏者，公持法以抗争，上怒洊加而终不移；及酷吏横行之际，为宁州刺史，以宽仁获百姓之心；再刺豫州，按越王贞之狱，密奏保全坐斩者六七百家，当籍没者五千余口免之；此岂尝有姑尚委随而与世推移以求曲济之心乎?”他由此讨论狄仁杰之无不正 “唯以道为心，以心为守，坦然无所疑虑，其视妖淫凶狠之武氏，犹夫人也，不见可忧，不见可惧。请复庐陵，而树张柬之等于津要，武氏灼见其情而自不能违，岂有他哉? 无不正之言，无不正之行，无不正之志而已矣。”他因此提出，“所谓社稷臣者无他，唯正而已矣。”

船山指出，以机权制物者，物亦以机权应之，君子固不如奸人之险诈，而君子先倾；以正自处，立于不可挠之地，而天时人事自与之相应。他辨析孔融之所以不能折曹操以保全汉朝，在于他“慷慨英多而荡轶于准绳者不少，操有以倒持之”；而东晋周顗、戴渊密谋匡主而死于王敦，几以亡晋，他们自己也有咎过。船山认为孔融之愤而或激，周顗、戴渊之智而或诡，两者病均，而智之流于诡者，其败尤甚。与二者不同，“虽有奇奸巨慝杀人如莽之气焰，而至于山乔岳峙守塞不变之前，则气为之敛，而情为之折”，船山赞扬这正是狄仁杰之所以为别人所不可及处。[35]

船山一再强调“当危乱之世，镇之以静，虑之以密，一之以大正，而后可以为社稷之臣。”[36]

（五）大臣当简、静，易风俗、兴教育、养人才

核人以事功，督人以刑名，名为王道，实为法家之操切。这是船山所极力辨析、批判的，也是他评价大臣的标准。他强调大臣简、静、兴德教，才允为大臣，得大臣之道。

三国中，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而吴介其间，皆不敌，而角立不相下，船山辨析是因为吴国有人，足与诸葛亮颉颃。魏国得士虽多，无有及之者。立国之始，宰相为安危之大司，而吴国舍张昭而用顾雍，顾雍被船山赞为“允为天子之大臣”。他就此比较、辨析曹魏所用之人行法家之操切，而诸葛亮相蜀，亦不能免，顾雍却有大臣之简、静，只有宋之大臣李沆近之。船山分析道 “曹氏始用崔琰、毛玠，以操切治臣民，而法粗立。王道息，申、韩进，人心不固，而国祚不长，有自来也。诸葛之相先主也，淡泊宁静，尚矣。而与先主皆染申、韩之习，则且与曹氏德齐而莫能相尚。三代以下之材，求有如顾雍者鲜矣。寡言慎动，用人惟其能而无适莫；恤民之利病，密言于上而不炫其恩威；黜小利小功，罢边将便宜之策，以图其远大。有曹参之简靖而不弛其度，有宋璟之静正而不燿其廉。求其德之相若者，旷世而下，唯李沆为近之，而雍以处兵争之世，事雄猜之主，雍为愈矣。故曰：允为天子之大臣也。”这段话中的“寡言慎动，用人惟其能而无适莫”乃是针对历史上很多大臣之尚言、用人而启党争，“密言于上”则是针对大臣之与上争权、争名。

船山最终惋惜吴无汉之正、魏之强，而终于一隅。不然，以平定天下而有余。[37]

三国顾雍允为大臣，而东晋可胜大臣之任者，船山认为是郗鉴。二人有共同处，都非法家之操切。船山指出晋之败，败于上下纵弛，基于大弛之弊而反之以大张，则大张必穷，而终之以大弛，名为王道，而实为申、商，不覆人之家国者无几。当时卞令固然是忠贞之士，朝廷之望，执法纪，厉色立朝以警群臣之荡佚，诚然是不可无，但于收人心、易风俗、而

安社稷则不能。船山指出，“先王忧人心之易弛而流也，劳来之以德教，而不切核之以事功；移易之以礼乐，而不督责之以刑名”。[38]

东晋谢安“任桓冲于荆、江，而别使谢玄监江北军事，晋于是而有北府之兵，以重朝权，以图中原，一举而两得”，后来肥水之战之胜实依靠北府兵，船山赞扬此举可谓“谟猷之訏远者”，可见其“知立国之弘规”。[39]谢安秉国政十年，桓冲死，谢安分荆、豫、江三州以授诸桓，桓玄之祸始于此。船山指出谢安之虑桓氏已熟，折桓冲而令其无功愧死，其势可以尽削桓氏之权，以奖晋室。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自以父子名位太重，贻桓氏以口实，不得已而平其怨忌。但实际上忧不在桓氏，而在司马道子、王国宝，“二奸伏于萧墙，蛊孝武以忌安，而不足以相胜，则必假手桓氏以启衅”。谢安所任者为石虔、石民等，“以为差愈于玄而可免于乱，然而终不能免，则安穷矣”。

船山认为谢安并非就无道处此，以保身而靖国。船山指出：“谢安秉国政于此十年，太后归政而已录尚书八年。夫岂晋廷之士举无可大受之人材，使及早而造就之以储为国之柱石者？冲死之后，内不私之于子弟，外不复假于诸桓，君无可疑，相无可谤，而桓氏亦无所倚以争权。”[40]他因此批评谢安之识早不及此，惴惴然求以弭谤，最终临事周章，亦其必然之势。他认为治道之“大用，用贤而兴教也”[41]，他由此批评谢安“量不弘而虑不周，有靖国之忠，而惘于大臣之道，安不能免于责”。[42]

（六）大臣之独立不受拥，孤立自任

基于明末党争带来亡国之沉痛，船山对于历史上东汉、唐、宋历代的党争尤加措意，他叹息“唐、宋以还，败亡一轨”，都是因为党争，他更痛惜“乱之初生，自所谓君子者开之，不但在噂沓之小人也”[43]。朋党之兴起与大臣有至为紧密的关联。

船山溯源朋党之兴，始于汉元帝之世。萧望之、周堪二人固然是雅意欲为君子者，其攻史高、弘恭、石显，以弼主于正，固然是君子之道。船山指出，萧、周二人“奉遗诏，秉国政，辅柔弱之主，甫期年耳。元帝浮慕之而未尝知之。使二子果以抑群小、清政本为远图，身任之，以死继之，其孰敢不震叠焉？”而二人所为却异于此，二人“身为大臣，国是不决”，乃悬朝廷之禄位以引躁进喜事之人，而借以望其援助，以击弘恭、石显，最终成不可解之祸。船山由此总结朋党之兴，必有败类以相附，而贻小人之口实，大臣当孤立自任：“使为君子者，远爵赏之权，泯交游之迹，不歆便佞之推戴，不假新进以攻排，无瑕可求，孤立自任，则败类恶得而乘之？”[44]

西汉何武是与人互引，东汉萧望之是引人，而唐裴度则是为所附之士所挽而不得退。船山指出，唐宪宗之用裴度也深，而信之也浅，所倚以谋社稷之大计，协心合德而不贰者，独淮蔡一役而已。船山析述此后裴度所面临的必退的形势：“然当其时，已与李逢吉、王涯旅进而无别。及乎淮蔡既平，公居首辅，而宦官承宠为馆驿使，赐六军辟仗使印，公不能以一言规正；皇甫镈、程异以聚敛与公分论道之席，公力争，而以朋党见疑；浚龙首池，起承晖殿，张奉国、李文悦白公谏止，而二人坐贬。”船山认为这几件事有一件发生，裴度就应该马上拂衣以去，而他且层累相违，终栖迟于朝右，船山认为裴度并非贪荣宠以苟容，而是有其原因的，他就此分析裴度为其所附之士所拖累而不得退，偃仰以息其浩然之志这一原因：“公开阁以延士，而一时抱负之士，皆依公以利见，公去则不足以留，必群起而为公谋曰：公不可去也，委任重而受知深，志虽不伸，自可因事纳忠，以大造于家国，公姑隐忍以镇朝廷，使吾党得竭股肱之力，以持危而争胜。此言日进，公且不能违，而偃仰以息其浩然之志，所必然矣。故公俛仰中外，历事暗主，狎迩宵人，乍屈乍伸，终留不去，皆附公之末光者相从臾以羁迟也。”

裴度之浮沉前却，在船山看来，虽不谓无补于昏乱，则从臾者之言亦未为无当，但是“通数代之治乱而计之，则所补者小，所伤者大，起水火之争，酿国家之祸，公未及谋也。”他又指出“为公谋者，其志、其量、其识，皆不足以及此，而公大臣之道以诎矣”，值得注意的是船山在此以“志、量、识”论“大臣之道”。

船山进而指出国家之患：“莫大乎君子以

若进若退之身与小人迭为衰王，而祗以坚小人之恶”，原因在于：“君子之道，不可则去耳。小人乃不以君子为忧，而聚族以谋攻击，则忌媢之恶，所逞者即自起于其朋俦，而同归于消灭。邺侯一归衡山，而张良娣、李辅国之首交陨于白刃。唯君子终留于位，附君子者，犹森森岳岳持清议于廷间，且动暗主之心，而有所匡正；小人乃自危，而益固其党以争死命，抑且结宫禁、挟外援以制人主，而其势乃成乎不可拔。泰之拔茅以汇也，否亦拔茅以汇也，而君子之汇，终诎于群策群力之险毒。故刘向不去，而王氏益张；李膺再起，而宦官益肆；司马温公入相，而熙丰之党益猖。”

船山提出“大臣之道，不可则止”，这并非只是保身为哲，实是以静制天下之动，而使小人之自敝。船山强调“惟独立不受人之推戴，乃可为众正之依归。”[45]

前述李绛善谋，船山在别处又批评他作为大臣，恃其忠直，以言与小人李吉甫角长短而启朋党之争，不知大臣之体，因此不能胜任大臣之道，所谓大臣之道是不以身任天下之纷纭。船山分析大臣之言，尤其是不再言：“夫大臣者，衷之以心，裁之以道，持之以权，邦之荣怀与其杌陧系焉者也。不得已而有言，言出而小人无所施其唇舌，乃可定众论之归，而扶危定倾于未兆。若其一再言之，君已见庸而众嚣莫止者，必君志之未定，而终且受诎，则所谓‘不可则止’者矣。”[46]船山将李绛之后的牛、李党争溯源于李绛与小人相角以言。[47]

士人喜以上书陈利病为尚，船山认为凡上书陈利病，以邀主听，希行之者，其情不一，其无一之足听则是一样的。他先分析其中有三种情形是大奸募事外之人、怀私之士、小有才者“皆怀慝之奸，訹君相以从己，而行其胁持者”，接着精微地辨析了此外四种情况。其一，搜索故纸，自己也未尝信为可行：“有闻君之求言也亟，相之好士也甚，熏蹠而兴，本无定虑，搜索故纸，旁问涂人，以成其说；叩其中怀，亦未尝信为可行，而姑试言之，以耀人之耳目。”其二，索一二事并掇拾迂远之陈言：“有始出田野，薄游都邑，受一命而登仕籍，见进言者之耸动当时，而不安于缄默，晨揣夕摩，索一二事以为立说之资，而掇拾迂远之陈言以充幅；亦且栩栩然曰：‘吾亦为社稷计灵长，为生民拯水火者也’，以自炫而已矣。”其三，诵一先生之言，附以历代之因革：“有诵一先生之言，益以六经之绪说，附以历代之因革，时已异而守其故株，道已殊而寻其蠹迹；从不知国之所恃赖，民之所便安，而但任其闻见之私，以争得失；而田赋、兵戎、刑名、官守，泥其所不通，以病国毒民而不恤。”其四，言一事、一地之利弊：“有身之所受，一事之甘苦，目之所睹，一邑之利病，感激于衡茅，而求伸于言路。其言失也，亦果有失也。其言得也，亦果有得也。而得以一方者，失于天下；得以一时者，失于百年。小利易以生愚氓之喜，隐忧实以怵君子之心。若此者，心可信也，理可持也，而如其听之，则元气以伤，大法以圮，弊且无穷。”

船山以上之论乃基于北宋李沆之史事，李沆是被船山一再称道的大臣，船山也一再引李沆之自言：“居位无补，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可以报国。”船山就此论及大臣之道，作为心性之学的“志”、“量”、“识”并赞叹李沆识量之大：“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此可以当之矣。道者安民以定国，至正之经也。秉道以宅心而识乃弘，识唯其弘而志以定，志定而断以成，断成而气以静，气静而量乃可函受天下而不迫。天下皆函受于识量之中，无不可受也，而终不为之摇也。大矣哉！一人之识，四海之藏，非有道者，孰能不惊于所创闻而生其疑虑哉?”船山以对“天下有其大同，而抑有其各异，非可以一说竟也久矣”之识来理解李沆之识：“其大同者，好生而恶死也，好利而恶害也，好逸而恶劳也。各守其大经，不能无死者，而生者众矣；不能无害者，而利者长矣；不能无劳者，而逸者达矣。天有异时，地有异利，人有异才，物有异用。前之作者，历千祀，通九州，而各效其所宜；天下虽乱，终亦莫能越也。此之所谓伤者，彼之所自全；此之所谓善者，彼之所自败。虽仁如舜，智如禹，不能不有所缺陷以留人之指摘。识足以及此，则创制听之前王，修举听之百执，斟酌听之长吏，从违听之编氓，而天下各就其纪”。船山进而分析，既有此识，则能不受陈言者之摇动：“陈言者之至乎吾前，知

其所自起，知其所自淫；知其善而不足以为善，知其果善而不能出吾之圜中。蝉噪而知其为夏，蛩吟而知其为秋，时至则鸣，气衰则息，安能举宗社生民以随之震动?”如此，就能使天下之人各正其性命：“而士自修其素业，民自安其先畴，兵自卫其职守，贤者之志不纷，不肖之奸不售。容光普照，万物自献其妍媸，识之所周，道以之定。故曰：‘天下之动，贞于一者也。’”

船山就此将李沆与历代名臣作一比较：“文靖之及此，迥出于姚元之、陆敬舆、司马君实之表，远矣。前乎此者丙吉，后乎此者刘健，殆庶几焉。其他虽有煌炫之绩，皆道之所不许也。以安社稷不足，而况大人之正物者乎？有姚元之，则有张说；有陆敬舆，则有卢杞；有司马君实，则有王安石；好言而莠言兴，好听而讼言竞。唯文靖当国之下，匪徒梅询、曾致尧之屏息也；王钦若列侍从而不敢售其奸；张齐贤、寇准之伉直而消其激烈；所以护国家之元气者至矣。”李沆去世后，宋乃多故，笔舌争雄。[48]

李沆对于上书一切报罢，而大臣进位宰执，而条列时政以陈言，自李沆之后吕夷简始。其后韩琦、范仲淹、富弼、司马光诸君子，出统六师，入参三事，皆于受事之初，例有条奏。《礼记·表记》说：“天下有道，行有枝叶，天下无道，言有枝叶。”船山以此知诸君子失大臣之道，他辨析大臣之不当烦言以耸众听：“天下之事，唯君与我坐而论之，事至而行之，可兴则兴之已耳，可革则革之已耳。唯道之从，唯志之伸，定命以辰告，不崇朝而遍天下，将何求而不得？奚待烦言以耸众听？如其微言而不悟，直言而不从，欲行而中沮，欲止而旁出；则有引身以退，免疚恶于寸心，而不待暴白以号于人曰：‘吾已缕析言之，而上不我庸也。’此宰执大臣所以靖邦纪而息嚣凌之枢要也。”船山因此感叹昔日李沆以实心体国，奠七十余年社稷生民于阜安者，一变而为“尚口纷呶之朝廷，摇四海于三寸之管”。他由此谓宰执之道在于“司听言以待黜陟耳，息浮言以正人心。言出而行浇，言长而忠薄，言之不已，而国事不可为。”对于宋代大臣之奏章，“读者惑焉，诧为盛美，违山十里，蟪蛄犹闻。”[49]船山批评宋人之议论表面之美实质之大害：“读其书，言不可胜求也；闻其名，美不可胜传也。即而察之，外强而中枯；静而诊之，脉浮而筋缓；起伏相代，得失相参。契丹胁之，而竭力以奉金缯；元昊乘之，而兵将血于原野。当时之效，亦可睹矣，奚问后世哉！”[50]船山因此提出“束宋人章奏于高阁，学术治道庶有瘥焉”，他感慨“俗论不然，宜中国之日疲以蹙也。”[51]

司马光之上条奏为船山所批评，而他不能止“儿童走卒”挟己以争上，亦为船山所批评，船山指出“夫新法之病民，迫欲司马之相以蠲除之者，犹情理之正也。然而朝廷之用舍，国政之兴革，岂此喧呶一往之气所可取必者哉?”他认为司马光之不得行其志的原因正在于此，所以宋哲宗亲政之后，天子厚其疑忌，“以为是率乱民而胁上以相己者，固已目无君上”。船山将司马光与谢安、郭子仪作一比较：“谢安石抗桓温，却苻坚，而民不知感。郭子仪厄于程元振，困于鱼朝恩，而众不为伸。”[52]

（七）大臣之道及其与心性之学的关系

以上先讨论了船山对各种臣子的批评，然后是对允为大臣或不可以为大臣的辨析，在各种比较中，即臣子与大臣的比较，不可以为大臣与允为大臣的比较，不得大臣之道与得大臣之道的比较，显示出大臣之不易以及何为“大臣之道”，接下来就可以对“大臣之道”作一简单归纳。

船山在《宋论》中对“大臣之道”有一归纳：“国家之政，见为利而亟兴之，则奸因以售；见为害而亟除之，则众竞于嚣。故大臣之道，徐以相事会之宜，静以需众志之定，恒若有所俟而不遽，乃以熟尝其条理，而建不可拔之基。志有所愤，不敢怒张也；学有所得，不敢姑试也。”[53]

“大臣之道”也贯穿于船山经解中，船山学问的特点是经学与史论的互相交融、互相贯穿，释经时史论在其中，而史论的依据则是经义，经史的合一背后是理与势的合一。兹引其《诗广传》中结合李沆之史事而发其对于“大臣”之议论：“唯裕也是以可久，唯密以是以自得。自得以行其志而久不迻，可以为天子之

大臣矣。《考盘》之'硕人'所以为硕也。诸葛亮密矣，其未裕乎？裴度裕矣，其未密乎？夫裕以密，则用而天下世受其福，不用天下不激其祸。……'硕人之宽'，规之远也；'永矢勿告'，怀道必行而不为之名也。不肖者消，贤者安之也。三代而降，其唯李沆乎！函天下而不宠其智勇，听天下而不丧其枢机，宋乃以之蒙数世之安。故硕人者，正己而有光辉者也。"[54]

将上面两段话结合前面的讨论，可大体将"大臣之道"归纳为：持大正，独任，平情，和平，静，宽，简，密，裕。船山常感叹知"治道"者甚少。

大臣之道的这些德行正是允为大臣者区别于各种士、也区别于貌似大臣者的关键处，它显示出真正成熟的政治，显示出责任之重，对政治后果之承担，它是政治品格与政治能力的一体，是最高的政治实践的智慧。在此，船山对于"至善"的诠释特别值得重视，他将"至善"释为"皆得咸宜"，强调行为的结果，曰："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何以谓之善，处焉而宜之谓也。何以谓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谓也。不行胡得？不处胡宜？则君子之所谓知者，吾心喜怒哀乐之节，万物是非得失之几，诚明于心而不昧之谓尔。非君子有异教也，人之所以为人，不能离乎君民亲友以为道，则亦不能舍夫人官物曲以尽道，其固然也。"[55]由此可见至善与大臣之道之合一。

具备大臣之道的允为大臣者，既区别于直谏之士、意气之士、疏庸之士、躁人等士人的不考虑后果，他们或是出于道德理想主义，或是出于意气，或是出于政治能力不足，但在不考虑后果上却是共同的。同时，大臣也区别于功名之士、虔矫之吏、游士等的不择手段，区别于清高之士的逃避政治。[56]

大臣之道又是与作为心性之学的"志"、"量"、"识"一体的，"志量识"是船山经学的一个核心点。[57]前述关于李沆、裴度的史论中贯穿了"志量识"。船山批评裴度"其志、其量、其识，皆不足以及此，而公大臣之道以诎矣"，他在引李沆之自言"居位无补，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可以报国"之后就将大臣之道与"志"、"量"、"识"联系在一起："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此可以当之矣。道者安民以定国，至正之经也。秉道以宅心而识乃弘，识唯其弘而志以定，志定而断以成，断成而气以静，气静而量乃可函受天下而不迫。天下皆函受于识量之中，无不可受也，而终不为之摇也。大矣哉！一人之识，四海之藏，非有道者，孰能不惊于所创闻而生其疑虑哉？"在狄仁杰的一条史论中，船山也完全用到"志"、"量"、"识"。[58]可见"志量识"是船山评价大臣的标准，它与"大臣之道"完全是一体的，大臣之道之持大正、独任、平情、和平、静、宽、简、密、裕完全可以被涵括于"志量识"之中。

三、余论

船山在其史论中对于大臣之道的思考乃与其本人刻骨铭心的政治经验之间具有血肉般的关联。理解其政治经验，从其所推重与反对的人出发是一路径。船山在《永历实录》中所记曾与其共事的辅臣严起恒、瞿式耜为其所推重者，也是大臣之选。他记录严起恒在时局动荡中与民休息，兴教化，"宽简"，"清慎端和"，"不妄依附"[59]，这些足以让人联想起船山史论中"社稷大臣"之选。佞幸王化澄、宦者马吉翔为船山所忿疾者，正是他们使得永历南明政治回天无力、终不可为。这是无法脱困的历史困境。

船山是困境中的思想家，他把对南明以及晚明政治的反省贯注于他的史论中。晚明民族、流民、士气、党争、崇祯行申韩政术，以及有明一代废三公、卫所制、台谏合一、复古等问题都曲折地影响到他对历史的思考，笔者对此另有专文讨论。船山将明代问题溯源至宋代，更而往上至唐、秦汉，而对整个二千年历史作出省察。他的思考既内在于他的经验，同时最终又能走出自己的经验，超越自已经验的限制，而更为开阔、持重地省察长时段历史。而对长时段历史的考察之重点则如其在《读通鉴论·叙论》所说"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尽然之实，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而轻重别，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60]，船山进入了历史最精微处，精微的辨析才能使

我们真正进入真实而充满张力的历史——长时段与一时一事的一体化，其中人事背后有“心”，此正如船山在《读通鉴论·叙论》另一处中所说“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⑥①

＊敬以此文恭贺余敦康先生今年八十大寿。感谢杨念群教授在“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拙文的评论以及之后所提出的修改建议。

①王夫之：《读通鉴论·唐中宗·一》（下）（北京：中华书局，1998），页626。

②王夫之：《宋论》，《船山全书》（第11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页173。

③《宋论》，页90。

④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下），页956。

⑤《读通鉴论·晋怀帝·一》（中），页325-326。

⑥《读通鉴论·唐武宗·一》（下），页798-799。

⑦《读通鉴论·三国·二〇》（上），页278-279。

⑧《读通鉴论·唐太宗·九》（中），页598-599。

⑨《读通鉴论·汉宣帝·六》（上），页81-82。

⑩《读通鉴论·汉顺帝·一》（上），页199-200。

⑪《读通鉴论·唐宣宗·八》，页817-818。

⑫《宋论》，页220-223。

⑬《宋论》，页42。

⑭《读通鉴论·唐宪宗·三》（下），页755-757。

⑮《读通鉴论·汉哀帝·七》（上），页112-113。

⑯《读通鉴论·汉灵帝·七》（上），页221。

⑰《读通鉴论·汉文帝·一》（上），页24。

⑱《读通鉴论·汉文帝·二三》（上），页42-43。

⑲《读通鉴论·汉宣帝·一三》（上），页86。

⑳《读通鉴论·汉昭帝·四》（上），页76。

㉑《读通鉴论·晋惠帝·一三》（中），页324。

㉒《读通鉴论·唐宪宗·九》（下），页763-764。

㉓《读通鉴论·东晋安帝·一六》（中），页403。

㉔《读通鉴论·叙论·二》（下），页952。

㉕《宋论》，页146。

㉖《读通鉴论·唐宪宗·一一》（下），页765-767。

㉗《读通鉴论·唐肃宗·四》（下），页680-681。

㉘《宋论》，页146-148。

㉙《读通鉴论·唐文宗·七》（下），页796-797。

㉚《读通鉴论·唐玄宗·一二》（下），页662-663。

㉛《宋论》，页91-92。

㉜《读通鉴论·唐中宗·一五》（下），页641。

㉝《读通鉴论·唐肃宗·一一》（下），页689-691。

㉞《读通鉴论·唐高宗·二》（下），页618-619。

㉟《读通鉴论·唐中宗·五》（下），页631-633。

㊱《读通鉴论·晋惠帝·一一》（中），页322-323。

㊲《读通鉴论·三国·七》（上），页267。

㊳《读通鉴论·东晋成帝·三》（中），页349

㊴《读通鉴论·东晋孝武帝·五》（中），页381。

㊵《读通鉴论·东晋孝武帝·七》（中），页383。

㊶《读通鉴论·叙论·四》（下），页954。

㊷《读通鉴论·东晋孝武帝·七》（中），页383。

㊸《读通鉴论·唐文宗·二》（下），页787-789。

㊹《读通鉴论·汉元帝·一》（上），页90-91。

㊺《读通鉴论·唐宪宗·一六》（下），页771-772。

㊻《读通鉴论·唐宪宗·一〇》（下），页764-765。

㊼《读通鉴论·唐文宗·二》（下），页787-789。

㊽《宋论》，页84-86。

㊾《宋论》，页113-115。

㊿《宋论》，页120-121。

⑤①《宋论》，页115。

⑤②《宋论》，页209-211。

⑤③《宋论》，页20。

⑤④王夫之：《诗广传》，《船山全书》（第3册），页336-337。

⑤⑤王夫之：《礼记章句》，《船山全书》（第4册），页505。

⑤⑥船山之“大臣之道”似乎近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与价值伦理相对的责任伦理，但责任伦理实不能尽大臣之道之万一，此涉及到中国治道之精微，在此不申论。

⑤⑦关于对“志量识”的专门讨论，参见拙文《志、量、识：心性之学与政治实践——以王船山经学与史论为中心》，《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4期。

⑤⑧《读通鉴论·唐中宗·一一》（下），页637-638。

⑤⑨王夫之：《永历实录·瞿、严列传》，《船山全书》（第11册），页375-381。

⑥⓪《读通鉴论·叙论·二》（下），页952。

⑥①《读通鉴论·叙论·四》（下），页956。